

欧洲的大学沿革

——兼论大学的使命

□ [法]陈力川

一、历史的光荣与耻辱

谈起欧洲大学的起源,大多数文字记载都说是在意大利的波伦亚(旧译波隆那),少数记载说波伦亚大学和巴黎大学孰先孰后实难公断。从行政的观点看,波伦亚大学的创建过程扑朔迷离,难以清楚地描述。大约是从1087年开始,波伦亚出现了两个学生自治团体,名叫 universitas,当时学生自行管理校务,直接支付教授的讲课费,在大学似乎占主导地位,这与后来教授治校的大学建制有本质的不同。12世纪至13世纪,波伦亚城市当局开始介入大学的管理,并给教授发放薪俸;罗马教皇遂下诏规定,教授的执照由教会颁发,学生渐失对大学的控制。至于巴黎大学的初原,其脉络则清晰可寻。1257年,法国国王路易九世(死后被罗马教廷封圣,史称圣·路易)采纳巴黎议事司铎,神学家罗伯特·德·索尔邦的建议,在罗马教皇的庇护下,建立了一所皇家学院,主授经院神学。后来为了纪念罗伯特·德·索尔邦,这所皇家学院改名为索尔邦大学,但它为皇权和神权护法的性质丝毫未变,甚至到18世纪,索尔邦大学还一直代行教会法庭的职责。从社会契约的角度看,索尔邦大学初期的使命是为皇权和天主教培养知识精英。其时索尔邦大学的教师均为教士,他们在皇权和神权的双重监护下,毫无独立性可言,更谈不上学术研究。教士在大学享有的特权以他们讲授的知识符合罗马教廷的教旨为条件。对此,曾数度出任中山大学校长的许崇清论曰:“中世时代并无教授和研究之别。所谓神学只是疏证耶教的义理。……研究学术,发明新理,实属当时学子

思念所不及的事。”^①在中世纪,索尔邦大学被称为“法国国王的长女”,这当然是法国被称作“罗马教廷长女”的比附。按照这个比附的逻辑,索尔邦大学当可称作“罗马教廷的外孙女”。

继波伦亚大学和巴黎大学之后,大学陆续在其他欧洲城市出现,它们大都只有神学、法学、医学和哲学四科,并各有所长。据说巴黎大学以神学著称,波伦亚大学以法学见长,意大利萨莱诺(Salerno)大学和法国蒙彼利埃(Montpellier)大学则以医学称道。中世纪欧洲大学的通用语言为拉丁文,“所谓医学、法学只是领解希腊、拉丁的医书法典”^②。其次,各国大学颁发的文凭普遍得到承认,这使教师和学生产生了很大的流动性,游学四方的人并不罕见(旧时,物资的流通受到严格的管制,但人却有迁徙的自由;如今,商品流通——合法的、非法的——肆无忌惮,但人的旅行却受护照、签证的限制,这也是一种本末倒置)。

欧洲大学性质的变化应当归功于印刷技术的发明和传播。初时,教会的卫道士不仅焚毁那些被指责为异端的书籍,而且不惜将印刷商处以火刑(这真可以说是步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后尘)。法国印刷商埃蒂安·多莱(Etienne Dolet)的悲剧命运颇有代表性。他不仅出版过法国文艺复兴时期诗人克莱芒·马罗(Clément Marot)和作家拉伯雷的著作,也印刷发行过《圣经》,最终却因亵渎神明罪和叛乱罪于1546年8月3日在巴黎牟贝尔广场(Place Maubert)惨遭火刑,刑前还将他双腿的肌肉和筋腱用老虎钳子扯断并将他吊起来示众。克莱芒·马罗和作家拉伯雷也随即遭到索尔邦大学教授诺埃尔·贝达(Noël Bédard)的迫害。虽然世上无人不知,意大利哲学家布鲁诺因坚持他的泛神论和宇宙无限的思想并传播哥白尼的日心学说于1600年被教皇克莱芒八世处以火刑,伽利略于1633年遭宗教裁判所审判并被迫收回自己的科学主张(其科学著作被付之一炬),但鲜为人知的是罗马教廷迟至1992年才在约翰·保罗二世的任期内为伽利略平反,对布鲁诺却以道歉了事,不予昭雪,理由是布鲁诺的理论与基督教的信仰水火不容。在布鲁诺的问题上,罗马教廷的立场至今得到路德教派和加尔文教派的支持。更鲜为人知的是意大利自然主义哲学家于勒-恺撒·瓦尼尼(Giulio Cesare Vanini)于1619年在法国图鲁兹被宗教裁判所处以火刑,年仅34岁,罪名是比达尔文早二百多年提出从猿到人的进化论思想。以瓦尼尼为代表的意大利自然主义者公开宣布:“我们看到一切都是大自然的创造。在自然以外,上帝的存在是无用和多

① 许崇清:《欧美大学之今昔与中国大学之将来》,见《大学精神》,杨东平主编,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年,第68页。

② 同上。

余的。”^①奇怪的是瓦尼尼的著作《自然的秘密》^②曾得到巴黎大学神学家的出版许可。瓦尼尼出事后,这些循规蹈矩的神学家们硬说瓦尼尼是在得到出版许可后才瞒着他们将自己的异端邪说塞到即将印刷的书中的。对于欧洲大学历史上这段黑暗的时期,原德国维尔茨堡(Würzburg)大学校长特奥多尔·贝克姆(Theodor Berchem)反省说:“我们知道为近现代开辟道路的很多重大科学发现都是在大学以外完成的,这些科学发现经常受到中世纪传统的阻挠和僵化的教条主义的迫害。不错,有时长期顽强抵抗科学进步的正是大学本身。”^③

在启蒙时代的前夜,有多少试图用科学的火炬照亮人类道路的勇者在宗教裁判所的柴火中殉难。然而,科学的火苗初时虽然微弱,最终却战胜了愚昧的烈焰,历经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欧洲人终于打破宗教教条的禁锢,从被动地敬畏、观察自然到认识、分析、解释自然。他们认识到科学不是神启的经文,而是启示人类的真理。

15世纪到16世纪,现代资本主义在欧洲的萌发使科学发现和社会进步的概念逐渐渗透到大学的校园,新学科的出现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大学的方向。宗教的抵抗势力仍然强大,但形势的发展已经出现不可逆转的局面。然而就在这一时期,大学精神的开放也伴随着民族主义的兴起,拉丁文遂成为民族主义的第一个祭品,它在大学的讲坛上被各民族语言所取代,边境管制使大学生和教师的迁徙变得困难,大学几乎沦为地方主义势力的温床。

欧洲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1809年诞生于柏林。其创始人是时任普鲁士教育部长的语言学家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是他第一个提出将大学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高等教育机构的特征之一是将科学视为一个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因此研究永远不应该终止。”^④柏林大学将教学和科研结合起来,以革新和超前意识为主导的科研随之成为大学使命的一部分。法国历史学家欧内斯特·拉维斯^⑤说:“现代大学和中古大学的不同,在于它们所依据的原则的各别。

① Marin Mersenne, voir Jean-Pierre Aubin, Georges Haddad, “L'Evolution des Universités dans la Société”, voir: www.crea.polytechnique.fr/personnels/fiches/aubin/EvolutionUniversitesSociete.doc.

② 这本书的拉丁文全称为: *De admirandis naturae reginae deaeque mortaliū arcanis* (《人类神奇壮观的自然界令人称羨的秘密》)。

③ Theodor Berchem, *Tradition et progrès. La mission de l'Université*, Leçon inaugurale au Collège de France (15/01/2004), p. 3.

④ Wilhelm von Humboldt, *Werke IV*, Darmstadt 1964, p. 256.

⑤ 欧内斯特·拉维斯(Ernest Lavisse, 1842—1922), 巴黎索尔邦大学教授, 1904—1919年间担任法国高等师范学院校长, 1900—1912年间主编出版了长卷《法国史》。



威廉·冯·洪堡塑像

中古把知识放在宗教的范畴中；现代则把知识放在科学的系统里：中古的生活原则是权威，现代的生活原则是自由。”^①以洪堡创建柏林大学为标志，此后几乎所有重大的科学发现都成为大学研究所和实验室的专利，知识的积累和传授成为大学教师的基本职责。洪堡创立现代研究性大学的意义在于将保护传统和追求进步作为大学的双重使命，传统代表了人类的记忆和知识的积累；进步代表了人类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没有历史的记忆，人类就无法创造美好的未来；没有好奇心和求知欲，现有的知识只能成为阻碍人类进步的绊脚石，大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几乎与洪堡创建柏林大学同时，曾在1806年的耶拿(Jena)战役大败普鲁士军队的拿破仑，却在法国大学体制之外建立了几所工科学校。奇怪的是法国大革命倡导平等、公正、博爱的价值观，然而大革命后却在政治上产生了独裁的帝制，在教育上产生了选拔严格的精英制。在这个体制下，大学和社会的契约变成为国

① 见孟宪承：《现代大学的理想和组织》，见《大学精神》，杨东平主编，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年，第76页。

家培养技术人才，几乎每个政府部门都有自己的工程师学校，如综合理工学院、矿业学院、桥梁道路学院、农业学院、中央工艺制造学院等等，专事培养对政府有用，能尽忠职守的技术官僚。这种双头马车式的大学体制，或曰二歧式体制的最大弊端，是割断了学科之间的联系，而这种联系一向被视为发明创造不可或缺的条件。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大规模社会运动和战争的冲击下，欧洲大学逐渐赢得对重大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干预权和发言权，成为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驱动力之一。大学权力的扩充使政权一方面提心吊胆，一方面视大学为意识形态可资利用的宣传工具。希特勒时代的德国大学就不惜为纳粹理论制造舆论，寻找根据，这无疑是大学历史上的又一个污点，致使在纳粹执政前后，许多德国和奥地利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其中以犹太人居多）远走他乡。最著名的有爱因斯坦、维特根斯坦、茨威格、哈耶克、波普尔……正如当年哈耶克的师友米塞斯预言的那样：“我们所有人都不得不背井离乡。”^②据哈耶克晚年回忆：“1932年9月，他回过一次维也纳，当时‘一大群各专业领域的同仁们聚会，米塞斯突然问大家，这会不会是我们最后一次相聚。大家起先都觉得有点奇怪，而米塞斯却解释说，再过12个月，希特勒就会掌权。当时大家都不相信，大笑起来’。”^③这段历史说明了大学的独立性对知识分子何等重要，大学丧失独立性的后果何等严重。

二、大学的独立与自治

大学的独立性涉及大学与国家的关系问题。欧洲大学与国家的关系错综复杂，难以尽述。如果我们不敢说各个大学都有一个共同的传统，至少可以说它们都有一个传统的倾向，这就是自治。1792年孔多塞^④在他的《公共教育普遍组织条例的草案和报告》中建议：“任何公权力都不应该有职权和经费阻碍发现新的真理，阻碍讲授与其个别政策及其暂时利益相违背的理论。”^⑤洪堡的说法要比孔多塞少一点儿理直气壮的冲劲，多一点儿老谋深算的婉转：“国家不应当要求大学向它提供即时和直接的利益，而应当相信如果大学达到其自身的最高目标，也就

① 阿兰·艾伯斯坦：《哈耶克传》，秋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第56页。

② 同上。

③ 孔多塞侯爵(Marquis de Condorcet, 1743—1794)，法国数学家、哲学家、政治家。26岁进入法兰西科学院，39岁当选法兰西科学院院士。1794年3月27日被雅各宾党人逮捕，次日死于狱中，据说是服毒自尽，以躲避上断头台的命运。

④ Condorcet, Rapport à l'Assemblée législative: Rapport et projet d'ordonnance sur l'organisation générale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 1792.

是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实现了国家的目的。”^①

大学为什么要有自治权？人类社会是由各种政治利益集团和经济利益集团组成的，大学要完成培养文化人和自由人的使命，需要与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势力保持一定的距离。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完善离不开科学和文化，正因为如此，大学才需要超越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暂时利益，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下，继承和发展全人类的知识水平。特奥多尔·贝克福姆解释说：大学的自治意味着“国家自愿放弃暂时的和可预见的利益，相信从长远的观点看，自由和独立的科学对社会更有好处。我不敢断言这个信念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被证明是对的，但是我敢说从未有哪一个国家对大学严厉的控制可以使研究和教学实现持久的进步”^②。简单地说，大学自治是为了避免学校成为民族主义及形形色色的意识形态的奴婢。大学要在更高的层次上，实现国家，而不是执政者的目标（在理想的情况下，国家和执政者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在现实中，两者的目标并非总是一致的）。所以争取大学的自治，不惟是学术自由和独立的问题，也是维护国家长远利益和尊严的问题，不惟是学生学者的责任，更是政治家、执政者的责任。大学能否自治取决于它与国家的关系的性质，反过来说，大学是否要求自治也决定了它给自己的定位。大学与那个时代它所处的国家和社会有着一个无形的契约。一个专制的国家和社会必然要求大学配合它的需要，惟有真正民主的国家和社会才能尊重大学的独立和自治，反过来说，真正独立的大学只有在真正民主的环境中才能存在。

思考大学的使命这个问题，有必要重温康德的文章《什么是启蒙？》。在这篇短文中，康德开门见山地说：“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③广义的启蒙运动不只是发生在西方18世纪的那场思想解放运动，启蒙运动也没有因为理性时代的开始而结束。因为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成见和教条，所以启蒙运动是一个人类不断脱离不成熟状态的过程。福柯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应该这么理解：全体人类都卷入了启蒙过程？如果正是这种情况，那么我们必须把

启蒙看成是影响到地球上所有民族的政治及社会生存状态的一种历史变化。”^④“因此，我们必须既把启蒙理解为一个人类集体参与的过程，又将其视作一项勇气鼓召之下由个人完成的行为。”^⑤

拉丁文 Sapere aude 如果采用直译，是“敢于思想”的意思，它体现了大学独立自由的精神。在反对各种形式的思想专制和话语霸权的意义上，大学是每一代人获得自由的地方。用康德的隐喻可以说，大学应使学生最终摆脱监护人而独立行走迈出坚实的步伐。在这个意义上，大学是启蒙运动世代交替的地方，“是将真理的进步与自由的历史直接联系起来的事业”^⑥。“然而，这一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还确乎是一切可以称之为自由的东西之中最无害的东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⑦由此可见，理性的真正力量并不在于占有真理，而在于获得真理。正如孔多塞所言，真理属于那些寻找它的人，而不属于那些自称占有它的人。在《什么是启蒙？》一文中，康德还出人意料地强调区分理性的公开运用和私下运用：“必须永远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并且唯有它才能带来人类的启蒙。私下运用自己的理性往往会被限制得很狭隘，虽则不致因此而特别妨碍启蒙运动的进步。而我们所理解的对自己理性的公开运用，则是指任何人作为学者在全部听众面前所能做的那种运用。一个人在其所受任的一定公职岗位或者职务上所能运用的自己的理性，我就称之为私下的运用。”^⑧在现实中，理性的公开运用不仅需要个人勇气，还需要制度上的保证。这样说似乎是矛盾的，因为有制度上的保证，个人勇气好像就是多余的了。但实际上，正因为理性的公开运用永远需要个人的勇气，制度性的保证才是必要的。

三、大学的观念与观念的大学

大学的观念应当是开放的。对“何为大学的本质？”，“何为大学的使命？”这样的问题，大学有权利、有责任去思考、发明和质疑。我们说大学的研究不应当有禁忌，当然也包括对其自身的本质及其使命的探寻。在众多大学的观念中，德里达提出的“无条件大学”值得注意。我们权且将之称作“观念的大学”。

① Wilhelm von Humboldt, *Werke IV*, Darmstadt 1964, p. 260.

② Theodor Berchem, "Tradition et progrès. La mission de l'Université", *Leçon inaugurale au Collège de France* (15/01/2004), pp. 11—12.

③ 康德：《什么是启蒙？》，何兆武译，文化研究网。

④ 福柯：《什么是启蒙？》，李康译，文化研究网。

⑤ 同上。

⑥ 同上。

⑦ 康德：《什么是启蒙？》，何兆武译，文化研究网。

⑧ 同上。



德里达

德里达说：“现代大学应当是无条件的。……这个大学要求而且应当在原则上享有，除了人们所说的学术自由之外，提问题和建议的无条件的自由，甚至于公开言说对于真理的探求、认知和思想所要求的一切的权利。……大学以真理为业，它宣布并保证毫无保留地为真理而奋斗。”^①无条件大学指“公开言说和出版一切的原则性权利，哪怕是以虚构和知识实验的名义”^②。德里达清楚地知道“这种无条件大学事实上是不存在的。但是在原则上，遵循它公开信奉的使命，根据它公开宣布的本质，大学应当是以批评——和超越批评——抵抗一切教条的、不公正的占有之权力的最后一个地方”^③。德里达进而补充说，超越批评的意思就是“解构”。

我们或许可以从四个方面阐释德里达这几段话的意思：

1. 大学的无条件性。大学不受制于任何条件的性质使“无条件性”成为大学存在的必要条件。因此，在理论上和原则上（或者说在观念上），“无条件性”应当永远作为大学的存在条件而存在。

2. 大学为真理服务。为了恪守它对真理的承诺，坚持它探索和言说真理的信仰，大学的自由，特别是研究和出版的自由就应当是无条件的（这就是为什么世界各国的大学通常都有自己的出版社，而大学出版社的商业化、市场化倾向是何等严重地威胁大学的自由，尤其是对学术成果的价值判断和知识积累的威胁）。

3. 无条件大学的乌托邦色彩。事实上不存在，不等于法理上也不应当存在，也就是说，已然状态不都是合理的，应然状态不见得不合理。乌托邦常因其目标

的不可企及而具有某种神秘性和神圣感：聆听纯理想的呼唤和对某种可能性的永久向往。

4. 大学的批评精神。大学的使命和本质要求它奉行对抗美学和解构主义，特别是对教条的和不公的权力持批评（解构）的立场。我们也可以采用蔡元培较为和缓（或消极）的说法：“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①

关于“抵抗的原则”，德里达提醒我们说：“这个观点的后果是，无条件的抵抗可能将大学与许多权力对立起来：国家的权力（即民族国家的政治权力及其主权不可分割的幻觉：在这方面，大学不仅在世界政治上，而且在普遍意义上，具有超前性，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世界公民身份和民族国家观念），经济权力（国家与国际资本的集中），传媒的权力，意识形态的权力，宗教与文化的权力，等等，总之，所有限制未来民主的的权力。”^②

德里达的可爱之处在于他那无所畏惧的堂·吉珂德精神：手握一枝笔敢向全世界宣战。如果说理性和思想的有力言说让我们看到的是德里达作为教授的学养；那么自我意识，或者说自我性的执著表现让我们看到的则是德里达那类似先知的品质。他讲授的内容既有知识，又超出知识的范围而进入先知警世预言的领域。他倡导的“抵抗的原则”必然使大学腹背受敌，可是这一原则的弱点也正是它的优点：敢于要求无条件独立、无条件自治的权利，或者说理直气壮地要求得到不可能完全得到的东西。大学的可爱和力量正在于它不识时务，不识抬举，不待权贵，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德里达强调说：“如果这个无条件性在原则上和法律上构成了大学不可战胜的力量，然而它却从来没有成为事实。正由于这个抽象的、言过其实的不可战胜性，甚至正由于它的不可能性、无条件性也暴露了大学的缺点和脆弱，暴露了它的无能为力，在所有控制它、包围它、企图将它据为己有的权力面前虚弱的自卫能力。因为大学外在于权力，因为它与权力的原则格格不入，故大学实无权力可言。”^③

大学的力量不是权力的力量，而是没有权力的力量。没有权力不等于没有力量，有力量也不等于有权利。你可以说大学是一个软弱的力量，它不堪一击，屡战屡败，但它却坚不可摧，屡败屡战。它可以被打败，也承认失败，但它不会屈服，也不会被征服。它可以还不是一个无条件大学，但它必须自以为已经是一个无条件

① Jacques Derrida, *L'Université sans condition*, Paris, Galilée, 2001, pp. 11—12.

② 同上，第16页。

③ 同上，第14页。

① 蔡元培：《大学教育》，《大学精神》，杨东平主编，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年，第74页。

② Jacques Derrida, *L'Université sans condition*, Paris, Galilée, 2001, p. 16.

③ 同上，第18页。

大学。它可能永远都生不逢时,但一经存在就好像生逢其时一样。它对外界可以不设防,也无法设防,但不能逃避,也无处逃避。它时刻都有消失的危险,但随时都可能浴火重生。

德里达并不讳言大学的软弱性:“大学由于其绝对的独立性而成为一个暴露无遗的城堡,它将自己奉献出来,它有待被占领,而且常常注定要无条件投降。无论到了什么地方,它都做好了投降的准备。它有时因不接受人家提的条件而不得已地、无能为力地、令人费解地无条件投降。是的,大学会投降,有时甚至出卖自己,它有被占领、被攻取、被收买的危险,它做好了成为跨国公司和集团的分支机构准备。这在今天的美国和全世界成为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研究和教学的组织应该在何种程度上得到支持,也就是说,直接或间接地受到控制,或者委婉地说,为了商业和工业的利益得到资助?”^①

德里达的这段话并非捕风捉影。近些年来,大学的科研越来越受到民间研究所的挑战,这些重视应用科学的民间研究所从企业得到的经费大大多于大学从政府得到的拨款。大量民间和企业研究所的出现缩短了基础研究转化为应用科学的时间,但是企业对科研项目的资助必然以对自己有利可图为依归,有时甚至以限制科研成果的公开发表为条件,申请的专利也会在相当程度上限制科学和技术发明得到全人类广泛利用的可能性。与此同时,跨国公司和财团的胃口也越来越大,逐渐将战略目标瞄准私立和公立大学,使知识出现了某种私有化的倾向。而“私有化阻碍了知识的传播,削弱了意在监控和保证学术质量的同行审查制度。与其鼓吹者所说的正相反,市场化的知识并不保证知识在社会上的更好传播”^②。因此大学有必要联合国家和其他合作伙伴,制定共同遵守的科研公约,避免科研经费过分依赖市场和私人企业,优先选择有公益价值的科研项目,保证非功利性研究项目的进行,规定科研成果的发表不受限制。这既是一场大学基础研究的保卫战,也是争取大学无条件自由的壮举。

德里达还提问道:“于是产生了一个不仅仅涉及经济、法律、伦理、政治的问题:大学能否要求无条件的独立,要求某种主权,某种独特的、例外的主权,而不冒最坏的风险,即由于这个独立主权的抽象性和不可能性,不得已无条件投降,任其被占领或廉价收买?”^③德里达一边反对民族国家的绝对主权,批评“主权不

可分割的幻觉”,另一方面要求大学的无条件主权。对这一看似矛盾的立场,德里达显然也觉得有必要加以澄清,他说:“……主权的价值今天正在解体。但是务必使这一必要的解构不至于危害大学独立的要求,即某种极特殊形式的主权……。”^④

在这本书的结尾,德里达揭示说:“无条件大学并非必然,唯一地存在于我们今天称之为大学的地方,也并非必然、唯独、最好由教授的形象来代表。无条件性的苗头在什么地方显露,无条件大学就在什么地方出现。”^⑤

大学并非进行自由思考的唯一地方,无条件性虽是大学的必要条件(可能说希冀的条件更恰当),但并非为大学所独有。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埃德加·莫兰说过“要想自由思考须在边缘思考”^⑥。这句话可以理解为:在任何一个体制中,包括相对独立自主的大学体制,自由思考都是不可能的。今天的大学保留了教学的功能和保存知识、文化的功能,然而自由思考的功能却在退化,有思考能力的教授在大学里从来不是如鱼得水的人物,究其原因,阻碍并不总是来自外部,大学本身的因素也很多。

我们在关于大学的所有定义中几乎总能找到一个共同点,这就是“大学是一个将高等教育和基础研究结合起来的机构”^⑦。我们知道,基础研究的基础恰恰是自由思考:不仅思考未知的事物,还要反思人类以往的思想成果,对一些毋庸置疑的知识提出疑问。大学的无条件性就是质疑一切的权利,包括质疑问题本身的价值和真理的价值,也就是说不受任何限制地发问,这是大学存在的理由,也是大学不可回避的责任。大学在要求无条件独立之前,自己能首先接受这一点吗?

四、今天的困扰和机遇

近些年来,一种来自社会的压力要求大学成为直接与职业挂钩的人才培训地,而事实却证明,现在的人才市场对某种专业人士的需要无法保证几年后这个专业的学生能找到相应的工作。因此,一个囊括多学科的教学大纲和扩大学生知识面的教学计划实为适应职业伸缩性的要求所必须,不论劳动市场如何反复无常,毕业生应具备转学科、转专业的基本能力。大学的任务不是一劳永逸地为社会提供专业人士。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使学生不可能只靠在校期间来掌握一生

① Jacques Derrida, *L'Université sans condition*, Paris, Galilée, 2001, 第18—19页。

② 阿里·卡赞西吉尔,《治理和科学:治理社会与生产知识的市场模式》,见《治理与善治》,俞可平主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41页。

③ Jacques Derrida, *L'Université sans condition*, Paris, Galilée, 2001, p. 19.

④ Jacques Derrida, *L'Université sans condition*, Paris, Galilée, 2001, p. 20.

⑤ 同上,第78页。

⑥ 见2004年12月9日埃德加·莫兰在法国人类进步基金会关于《伦理》一书的演讲。

⑦ Olivier Reboul, *La philosophie de l'éducation*, Que sais-je?, Paris, puf, 1989, p.43.

的职业生涯所需要的知识。因此成人教育和职业教育理应成为大学的重要任务之一。

在今天这个多极、多元的世界,大学的使命已经不能整齐划一,无论在教学领域,还是在研究领域,都已出现大学使命多样化的趋向,大学与社会其他部门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目前,欧洲大学普遍面临跨学科教学的课题。19世纪和20世纪,知识突飞猛进使各学科分野壁垒森严,“社会向‘管风琴’体制演变,在这个体制中,同一个领域的人即使处在地球的两端,也比邻居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①。21世纪的大学有超越学科,使知识融会贯通的任务,还要培养对世界的复杂性和整体性有适应能力和思考能力的人。为培养这样的人才而制定的教学计划势必重视跨学科知识,强调学科间的互补性,将消化不断更新的专业知识置于次要地位。社会的进步使许多新的问题成为大学的研究对象,例如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人权思想的普及,多元文化的共处,人类社会的永久和平等等。有人甚至主张“未来大学应该参加建构一个新的世界人道主义思想,以有效地消除现代化和经济、文化全球化的副作用”^②。夏尔·雷奥波·梅耶人类进步基金会主席皮埃尔·卡蓝默提出“21世纪的大学应是公民的、尽责的、协力的”观点。在他看来,21世纪的大学“面对的最大挑战是培养未来的公民。当然这里指的不是进行‘公民义务教育’,而是让每个人做好尽责的准备”^③。卡蓝默认为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责任,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法两国年轻一代的责任是建设欧洲。下一代人的责任不是建设欧洲,而是建设世界。他还引述法国哲学家米歇尔·塞尔的观点说:“为什么不能试想所有国家的大学,所有专业的一年级都学习同样的课程,例如:选择的伦理和公民资格(从地方到全球);文化间问题;共同的挑战;知识的联系和国际关系的建立。”^④

从对话的角度看,大学首先是不同学科对话的地方,每个学科的专家应具备吸收和理解其他学科知识的能力,以及超越本专业的局限思考问题的能力。有人预见,未来的科技进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多学科和跨学科的合作,即学科间研究。其次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大学使不同文化共存成为可能,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以单一文化自诩,因为这既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大学的开放,已经使教师

^① Pierre Calame, “L’Université du 21^{ème} siècle sera citoyenne, responsable et solidaire ou ne sera pas”, Fondation Charles Léopold Mayer pour le Progrès de l’Homme-site web: <http://www.fph.ch>.

^② Jean-Pierre Aubin, Georges Haddad, “L’Evolution des Universités dans la Société”, voir: www.crea.polytechnique.fr/personnels/fiches/aubin/EvolutionUniversitesSociete.doc.

^③ Olivier Reboul, *La philosophie de l’éducation*, Que sais-je ?, Paris, puf, 1989, p.43.

^④ Olivier Reboul, *La philosophie de l’éducation*, Que sais-je ?, Paris, puf, 1989, p.43.

成分和学生成分的国际化成为不争的事实。美国、英国、法国和德国成为接受外国学生最多的国家。在这四个国家的一流大学中,外国学生有意识无意识地接受了西方文化的主流价值,同时也将他们民族文化的血液注入到所在国的大学肌体之中。这种双向互动使外国学生成为西方大学争夺的重要生员。再者,大学是一个无所谓年龄的地方,几代人济济一堂,经年累月持续对话。教师传授知识、经验和伦理;学生通过课堂提问、课外活动、论文答辩加入学术研究和思考。正如怀特黑德^⑤所言:“大学的存在,就是为结合老成和少壮,而谋成熟的知识与生命的热情的融合。”^⑥最后,大学通过开门办学,学生到企业、公司和商界实习,与社会有生力量进行对话,了解社会需要,在实践中检验知识。

目前,欧洲的大学都有不同程度的欧洲化倾向,教学和科研领域的校际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课程设置的文凭趋向一致。整合后的欧洲大有继承中世纪知识共同体传统的趋势。况且,政治和经济画地为牢的时代已不复存在,今天,知识的分享已成为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必要条件。

正如当年印刷术的发明和应用发动了一场知识领域的革命,信息技术和因特网的普及正在引发知识领域的另一场革命。从积极的意义上讲,这场信息革命消除了时间和地域的阻隔,大大减少了知识传播的成本,对科学和工业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同时有助于打破信息垄断、新闻封锁、中央集权,有利于多元文化的存在和弱势群体的发声,为教师备课和学生自学带来的方便自不待言。

今天的大学面对的问题之一是它能否回避社会现实和人类的实际问题,特别是有些问题还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带来的。思考转基因植物、克隆动物和人等伦理问题不只是哲学家和神学家的事情,大学对科学技术(也有人主张称作技术科学)造成的后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大学既不是只钻研学问的象牙塔,也不是从事社会运动的广场,它应当将象牙塔和广场区分开来,但必要时也应该把象牙塔和广场连接起来。

五、没有结论的结语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大学的使命从一开始就在培养有用的人和自由的人之间摆动(前者的目的主要是社会的,其次才是个人的;后者的目的主要是个人的,其次才是社会的)。然而何为有用?对谁有用?人们却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例如

^⑤ 怀特黑德(Alfred North Whitehead, 1861—1947),英国逻辑学家,数学家,数理逻辑的创始人之一。

^⑥ 孟宪承:《现代大学的理想和组织》,《大学精神》,杨东平主编,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年,第79—80页。

对某种教条(无论是宗教教条,还是意识形态教条)有用的人,对科学和真理就是无用的人,甚至是有害的人。换言之,大学的使命游移于培养社会工具和自由思想者之间,前者需要的是工具人格,后者需要的是独立人格。我们可以从每个人对教育的看法知道他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例如1929年,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李登辉这样发问:“学生中有几个人够得上独立的初步,教师中又有几人能本着这个目的去教导学生呢?”^①在他看来,大学的使命显然是培养自由人和独立思想者。

现代欧美大学都以自由思想为教育理想(理想意味着与现实相去甚远),但我们知道自由思考并非早期大学的遗产,而是大学在不断摆脱教会控制的过程中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是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的欧洲大学维系不坠的宝贵传统。没有建立起这个传统的大学(或这个传统有所中断的大学)应当以此为努力的目标,已经建立起这个传统的大学应当使之发扬光大。我们或许可以说:思想自由虽与大学不同始,但求与大学同无终。

之所以强调思想自由,是因为这是教育的核心目的。只有达到这个目的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文化人。一所好的大学不在于颁发了多少文凭,而在于造就了多少文化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国诗人瓦雷里说:“文凭是文化的死敌。”^②“造就一个文化人”可以有多层可能的含义。第一层含义指:学习和教育不是一个阶段性的任务,不能以获得某种文凭为终结。文凭只能代表一个人接受过哪一种教育(当然教育水平因时代、国家和学校不同而异),但不能说明这个人是否达到了教育的核心目的。毋庸讳言,在这一层次上,所有大学制造的废品和次品都远多于成品,换言之,有文凭的人和有文化的人在数量上不成比例。第二层含义是说,教育的主要内容无外乎科学和文化。文化不是单纯的知识 and 技能,在这一点上,文化超越科学;然而文化通常与一个民族的地理环境、历史进程、政治制度、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在这一点上,科学又超越文化。如果说科学代表普遍性和同一性,文化则代表特殊性和多样性。一个真正的文化人必然是一个主张文化宽容和文化开放的人。第三层含义涉及“文化人”的范畴。文化人本身是一个笼统的称谓,孔子以“文、行、忠、信”施教,后世儒家以“诗、书、礼、乐”造士,可以说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人”与“士大夫”的意思接近。中国的文人与士大夫有“以天下为己任”的传统,正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但对这句话的解释,似可取明末清初顾炎武、王夫之的一些说法。^③如王夫之说:“天下不可一日废者,道也;天下废之,而存

之者在我。故君子一日不可废者,学也;……见之功业者,虽广而短,存之人心风俗者,虽狭而长。一日行之习之,而天地之心,昭垂于一日;一人闻之信之,而人禽之辨,立达于一人。……君子自竭其才以尽人道之极致者,唯此为务焉。有明王起,而因之敷其大用。即其不然,而天下分崩、人心晦否之日,独握天枢以争剥复,功亦大矣。”^④可见中国古之学者有延续“学统”、“道统”之责任,有“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因此“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意思,不一定是忧国忧民,时刻准备为国捐躯,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也可以是“独握天枢”,存道于我。西方意义上的“文化人”则多指那些通过汲取知识发展审美意识、判断力和批评精神的人,它既是一个人通过智力活动(知识加思考)获得个性解放(自由)的过程,也是“启蒙”的个人行为,可以说西方意义上的“文化人”更接近“知识分子”。但这种“知识分子”不仅要有知识,而且要有胆识和见识;既要敢言,又要善言;对真理和正义居敬执著,对世态炎凉处之泰然。

2005年11月—2006年1月,于巴黎

① 李登辉:《我们所需要的教育》,《大学精神》,杨东平主编,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年,第18页。

② 保罗·瓦雷里(Paul Valéry, 1871—1945),法国诗人,思想家。

③ 此观点参见贺麟《学术与政治》,《大学精神》,杨东平主编,上海:文汇出版社,2003年,第104—105页。

④ 王夫之:《读通鉴论》(全三册)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7月第1版,第274—275页。